

## 第七章 北魏三書對江左文化的態度

北魏孝文帝的遷都漢化不僅扭轉晉室南遷後北人文化信心低靡的窘境，更激勵北人對於政治大一統的豪情，遂開始對南方地域文化產生認同評價。不過，隨著北朝政治社會之變遷，北方人士對於南方文化的態度亦隨之變化，而大抵呈現三種類型：（一）開放型認同，表現為積極納入異質文化，對本土文化具有充分的信心，呈現一種平等對話的態度，酈道元可為代表。（二）排他型認同，表現為極端的排他意識，區分敵我、高下，楊銜之可為代表。（三）反思型認同，表現為反思與異質文化的關係，檢討文化交往中文化精神、傳統價值的損益，往往帶有明顯的批判色彩，魏收可為代表。<sup>1</sup>然而，思想行為總是發生在與歷史社會情境的互動之中，因此，下文將依據當時社會氣氛分別就酈道元、楊銜之、魏收對南方文化的態度進行析論。

### 第一節 酈道元的嚮往與包容

文化心態常以攻擊性、詆毀性、排他性、偏見性等呈現方式和民族國家連結在一起，這樣不但可以區分「我們」和「他們」，並藉著排斥「他們」來認同「我們」。酈道元《水經注》卻掙脫當時南北政治疆域的束縛，以開放的心理對南方地域文化表現出友善與嚮往的態度。<sup>2</sup>其於當時激烈競爭的歷史社會文化情境

<sup>1</sup> 本文所提三種文化認同型態係參照張寧：〈文化認同的多面性〉。張氏將認同型態區大致分為四類：開放型、排他型、反思型、被動無意識型。文章收錄於周憲主編：《中國文學與文化的認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頁13。

<sup>2</sup> Freedman認為，態度（Attitude）是個體對某一特定事物、觀念或他人所持之穩固的心理傾向，它是由認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和行為傾向（Behavior）三個成分所組成。認知成分是指人們對外界對象的心理印象，包括有關的事實、知識和信念，認知成分是態度其餘部分的基礎。情感成分是指人們對態度對象（object）肯定或否定的評價以及由此引發的情緒情感，情感

(situation)<sup>3</sup>中究竟是不是一個反常現象？可否從酈道元的思想軌跡與生命經驗找著合理的解釋？

## 壹、從酈道元的交遊圈看當時北方文士對南方文化的態度

酈道元交遊的對象除了前述第五章提及的李彪、崔鴻等史官之外，根據《魏書·高謙之傳》之記載亦能略窺酈道元的交遊圈：

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於贍恤，言諾無虧。<sup>4</sup>

這批人士除了高謙之沒什麼作品流傳之外，袁翻、常景、溫子昇均留有一些作品，於瞭解諸人對南方文化的態度頗有參考價值。

袁翻當世才秀，文高價重，然其名篇《思歸賦》的風格卻與南朝文士鮑照、江淹等人相近，模仿痕跡甚明：

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駁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為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惝恍兮知何語，氣繚

---

成分是態度的核心關鍵，情感不但影響認知成分，也影響行為傾向成分。行為傾向成分是指人們對態度對象所預備採取的反應。參見侯玉波編著，游橫山校訂：《社會心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1月），頁114-115。

<sup>3</sup> 案：本文「情境」一詞指稱；某個文化或次文化中的成員所熟悉的社會互動類型。參見Michael Argyle, Adrian Furnham, Jean Ann Graham著；張君玫譯：《社會情境》（Social Situations）（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6年），頁4。

<sup>4</sup> 見魏收：《魏書》，頁1710。

戾兮獨縈緼。<sup>5</sup>

曹道衡、沈玉成編著《南北朝文學史》即直截了當地認為袁翻《思歸賦》是努力學習南方文學技巧的成果。<sup>6</sup>

常景對於南方文學的仿效之跡較之袁翻更為明顯，據《魏書》本傳，常景曾撰《蜀四賢讚》：

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俗，白鶴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讚揚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sup>7</sup>

這四首五言詩是常景早年淹滯門下錄事時所作，分別詠讚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雄四人，有高才而無重位，藉古人為題安慰自身仕途失意，其立意與鮑照《蜀四賢詠》及顏延之《五君詠》相近，甚至在形式上完全仿照《五君詠》，儘管聲調格律未臻嚴格，但已注意到平仄相對。<sup>8</sup>常景正是沈約「四聲八病」說的擁護者，他曾撰作《四聲贊》：

<sup>5</sup> 見魏收：《魏收·袁翻傳》，頁 1540-1541。

<sup>6</sup> 參見曹道衡、沈玉成編著：《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 6 月），頁 379。

<sup>7</sup> 見魏收：《魏收·常景傳》，頁 1802。

<sup>8</sup> 參見曹道衡、沈玉成編著：《南北朝文學史》，頁 377-378。

龍圖寫象，鳥跡摛光。辭溢流微，氣靡清商。四聲發彩，八體含章。浮景玉苑，妙響金鏘。<sup>9</sup>

《北史·文苑傳》曰：「太和在運，銳情文學，……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胸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sup>10</sup>孝文帝朝的漢化政策帶動北朝社會對南方文化的學習風氣，反映在文學方面最顯著的例子即是詩歌聲律，而常景、袁翻在永明聲律這方面顯然下過苦功，故能對北方詩壇起拔籌革風之作用。

溫子昇名列北地三才，作為北朝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詩歌作品亦慕效南朝。如其名篇〈搗衣詩〉：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  
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蠓螭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sup>11</sup>

這首七言詩不論是聲調、用辭及雜用五言的句式，完全是齊梁詩風，皆可在南朝歌行體中找到祖本。<sup>12</sup>又例如〈詠花蝶詩〉：

素蝶向林飛，紅花逐風散。花蝶俱不息，紅素還相亂。芬芬共襲予，葳蕤從可玩。不慰行客心，遽動離居歎。<sup>13</sup>

---

<sup>9</sup> 引自弘法大師撰；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天卷·四聲論》（台北：貫雅文化事業圖書公司，1991年12月），頁112。

<sup>10</sup> 見李延壽：《北史》，頁2779。

<sup>11</sup> 引自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2221。

<sup>12</sup> 參見駱玉明、張宗原：《南北朝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頁172-173。

<sup>13</sup> 引自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2222。

這類詠物體的寫作靈感明顯來自於劉孝綽〈詠素蝶詩〉、簡文帝〈詠蛺蝶詩〉，模倣之跡不消細說。再例如〈春日臨池詩〉：

光風動春樹，丹霞起暮陰。嵯峨映連壁，飄颻下散金。徒自臨濠渚，空復撫鳴琴。莫知流水曲，誰辯游魚心。<sup>14</sup>

是詩語言風格幾乎與齊梁詩歌無異，取之置於南朝詩人詩集，幾乎令人無從分辨，足見受南朝文學影響之深。

從袁翻、常景、溫子昇對南方文學的歆慕與模倣觀之，他們對南方文化所抱持的心態應是開放而接納的，酈道元既遊於其中，應受濡染。北朝文士對南方文化的受容不只呈現在酈道元諸友，而應是當時文壇的普遍風氣，此從《北齊書·元文遙傳》所記載「濟陰王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sup>15</sup>的現象可見一斑。

## 貳、因為性愛自然而欣羨嚮往南方山水

酈道元在《水經注》的序文中自云「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sup>16</sup>，後因覺得《大禹記》、《地理志》、《尚書》、《職方》所記內容過於簡略，才利用閒暇闡述《水經》，其目的在於「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sup>17</sup>。這給人一種《水經注》僅僅是實用地理書的印象。山川地理、城鄉水利自是《水經注》的重要主題，但山水審美與歷史文化的闡述無疑占了絕大多數篇幅，其中蘊含酈道元對自然山水的珍愛及人文歷史的省思。

---

<sup>14</sup> 引自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222。

<sup>15</sup> 見李百藥：《北齊書》，頁 503。

<sup>16</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1。

<sup>17</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2。

陳橋驛曾說「酈道元是一位十分熱愛中國大自然的人」<sup>18</sup>；王師文進更進一步說：「酈道元本身其實是一位山水美學主義者」<sup>19</sup>。《水經注》中確實顯示了一些線索，以致於陳、王兩位先生有此推斷。酈道元在卷十二〈巨馬河〉「又東南過容城縣北」注寫其家鄉水域時，曾回憶家鄉自宅的風光，言宅西有巨馬水主流，宅東則有支流酈亭溝相通，蜿蜒流過田間，不但魚米之富令人懷念，更是難得的遊覽勝地：

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于迺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支流津通，纏絡墟圃，匪直田漁之贍可懷，信為遊神之勝處也。<sup>20</sup>

酈道元的童年時期，除了有一段時間在家鄉自然山水田園中成長，也隨著父親仕宦地之轉換而「宦遊」四方，這些甜美的遊歷經驗都詳錄在《水經注》中。卷二十六〈巨洋水〉就曾注記酈道元隨父親到青州臨朐的回憶：

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飛泉側瀨，于窮坎之下，泉溪之上，源麓之側，有一祠，目之為冶泉祠。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地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清泠特異。淵無潛石，淺鏤沙文，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以為嬉遊之處。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侍節東州。至若炎夏火流，閒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桂筍尋波，輕林委浪，琴歌既洽，歡情亦暢，是焉棲寄，實可憑衿。小東有一湖，佳饒鮮筍，

<sup>18</sup> 見氏著：《酈道元評傳》，頁 43。

<sup>19</sup> 見師著：〈北魏文士對南朝文化的兩種態度——以《洛陽伽藍記》與《水經注》為中心的初探〉，《臺大中文學報》第二十四期（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6 年 6 月），頁 144。收錄於師著：《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台北：里仁書局，2008 年 6 月）。

<sup>20</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1115-1116。

匪直芳齊芍藥，實亦潔並飛鱗。其水東北流入巨洋，謂之熏冶泉。<sup>21</sup>

此乃酈道元憶及少年時期偕伴泛舟熏冶泉，彈琴唱歌、怡然嬉遊的愉悅經驗。從酈道元能對三十年前的景物如此熟悉，可以想見其當年必然經常在熏冶泉一帶遊山弄水，是以寫來記憶尤為鮮明，筆觸格外細緻，情感更是黏膩。同卷〈淄水〉記青州城外石井水，更見酈道元對當年東齊這段少年歲月的珍惜：

陽水又東北流，石井水注之。水出南山，山頂洞開，望若門焉，俗謂是山為劈頭山。其水北流注井，井際廣城東側，三面積石，高深一匹有餘。長津激浪，瀑布而下，澎轟之音，驚川聒谷，湍湑之勢，狀同洪井，北流入陽水。余生長東齊，極遊其下，于中闊絕，乃積綿載。後因王事，復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賦詩言意。彌日嬉娛，尤慰羈心。<sup>22</sup>

酈道元因公而有機會與郭金、紫惠結伴故地重遊，並勾憶起當年遊於瀑布下面，聽激流由高瀉下喧囂山谷的少年情懷，竟也頗能解慰其羈旅之心，顯見徜徉山水的年少經驗已內化成酈道元樂山愛水的生命氣質。因此，即便酈道元的足跡未曾踏過南方土地，但卻仍可憑藉閱讀體驗南朝文人的作品，心領神會，視通萬里，從而撰寫刻畫令人驚嘆的南朝山水，使〈水經江水注〉成為千古文章。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段落莫過於卷三十四〈江水〉「又東過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流注之」注下：

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

<sup>21</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2206-2207。

<sup>22</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2236-2237。

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sup>23</sup>

這段經典文字正是李白名篇《早發白帝城》「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取材的底稿。<sup>24</sup>此連同卷四〈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寫黃河孟門瀑布之奇文，可謂《水經注》摹狀寫景之雙璧：

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河之巨阨，兼孟門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激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聳怒，鼓若山騰，濬波頽疊，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sup>25</sup>

孟門瀑布即今壺口瀑布，位於今陝西省宜川縣東，即北魏舊都平城以南，新都洛陽以北，乃酈道元常經之地；長江三峽則在南朝境內，酈道元大概無緣訪勝。然而，據陳橋驛實地勘查指出，酈道元不論寫瀑布或三峽，皆如臨景素描一般。酈道元對於足跡未至之處，總是廣蒐博取、悉心體會，然後援引原作，並加以潤飾修撰，即便非親眼所見，亦十分逼真。對酈道元描寫南方山水幫助最大的是東晉宜都太守袁山松所撰《宜都山川記》，酈道元寫三峽正是根據《宜都山川記》並參考其他文獻加工而成。豈知僅僅透過文獻資料而未能親見三峽風情的酈道元，信手寫來居然凌駕當年臨景描繪的袁山松，藝術成就甚至超過他曾親履其地的孟

<sup>23</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2834。

<sup>24</sup> 參見陳橋驛：〈《水經注》和它的文學價值〉，收錄於氏著：《水經注研究四集》，頁 365。

<sup>25</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281-282。

門瀑布。<sup>26</sup>或許可以說：酈道元寫黃河孟門，是親臨詠歎，活靈活現，藝術才華的充沛顯露；寫長江三峽，是傾心向慕，神來之筆，生命態度的自然湧現。酈道元注〈江水〉曾特引袁山松之臨江感懷，此中頗有自況之趣：

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疊嶂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sup>27</sup>

譚家健指出：「這段文字，不但寫景抒情俱佳，而且還說明了一個深刻的美學原理：美的事物只有被具有審美眼光的人所發現，才能成為審美的對象，美的主體和客體是不可分割的。酈道元在這裡特意引述袁山松的話，正是為了說明自己的審美觀點和表達他對祖國山川的熱愛。」<sup>28</sup>李知文亦曰：「（酈道元）借袁山松的話把自己說成是使山水驚喜的知己。」<sup>29</sup>陳橋驛則言：「袁山松的話，把它移到酈道元身上，真是張冠李戴。」<sup>30</sup>譚、李、陳三人不約而同指出：酈道元所引袁氏之語無異自身之寫照。若不是酈道元性愛自然的生命質地，及其對南方山水的嚮慕之情，即便其寫作技巧精妙卓異，也恐難在山水美學的領域中達到如此高的藝術成就。兩相比較，袁山松是親臨江水而流連忘返；酈道元則透過紙上地記神思江水之美，境界似又略勝一籌。類此情形也發生在酈注漸江水寫定陽溪的一段話：「夾岸緣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連，雜以霜菊金橙，白沙細石，狀如凝雪。

---

<sup>26</sup> 參見氏著：《酈道元評傳》，頁 47-51。

<sup>27</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2845。

<sup>28</sup> 見氏著：〈試論水經注的文學成就〉，收錄於譚家健、李知文選注：《水經注選注》，頁 6。

<sup>29</sup> 見氏著：〈試論水經注的語言藝術〉，收錄於譚家健、李知文選注：《水經注選注》，頁 493。

<sup>30</sup> 見氏著：《酈道元評傳》，頁 50。

石溜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sup>31</sup>酈道元透過文獻想像定陽山水，卻如目睹實景，儼然徜徉其中，發出「山水之趣，尤深人情」之詠歎，此顯然不止想像力的作用，而有一種生命的神心妙遠在當中。

### 參、「學在四夷」的文化觀使之更具地域包容性

太和時期德化四鄰的政治調性孕育了酈道元恢弘開闊的視野。北魏遷都洛陽之後，更在京畿裡規劃創設四夷館及四夷里，<sup>32</sup>此廣納周邊民族的格局氣魄，亦使酈道元能夠站在洛陽文化的制高點俯瞰南北地域文化。而隨侍孝文帝身旁的寶貴經驗，不僅使酈道元免於陷入南北文化之爭的歷史心結，變成偏狹的文化主義者；甚至進一步幫助他學習體認儒家「學在四夷」的深刻內涵，使他的文化觀格外恢弘。《水經注》卷二十五〈沂水〉注引《左傳》中孔子稱讚邾子事：

《春秋·昭公十七年》，邾子朝魯，公與之宴。昭子——叔孫婁，問曰：少昊鳥名官，何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黃帝、炎帝以雲、火紀官，太皞以龍紀。少皞瑞鳳鳥，統歷鳥官之司，議政斯在。孔子從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sup>33</sup>

酈道元在此觀念引導之下，以平實而肯定的態度記錄邊緣少數民族對華夏民族歷史文化所作的貢獻，例如〈潛水〉「潛水出巴郡宕渠縣」注記蠻族賈人曰：「縣以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蓋古賈國也，今有賈城。縣有渝水，夾水上下，皆賈民所居。漢祖入關，從定三秦，其人勇健，好歌儻，高祖愛習之，今《巴渝儻》是也。」<sup>34</sup>〈江水〉「又東南過樊到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也曾引《地理風俗

<sup>31</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3293。

<sup>32</sup> 參見王靜：〈北魏四夷館論考〉，《民族研究》（1999 年第 4 期），頁 75-82。

<sup>33</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2171。

<sup>34</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2460-2461。

記》稱讚古代部族獫狁人乃「夷中之最，有人道。」<sup>35</sup>同時在敘述西南地區時，對於當地少數民族的歷史傳說、文獻轉引亦多能如實記載，並無故意輕詆醜化之意，此與當時北魏孝文、宣武以來的民族融合政策互相呼應。<sup>36</sup>

《水經注》開卷第一篇〈河水注〉爲了替黃河溯源，不從北魏實際領地寫起，反而從域外國家開始記述，由于闐國、鄯善國、屈茨國、烏夷國、疏勒國、渠犁國等等一路寫回中原。過程中甚至一度寫到更遠的古印度國境，幾乎不受地域本位心態的影響。這樣一來反而突破了傳統以長安、洛陽爲中心的空間限制，無形中擴大北魏的國土邊界。當視野所及愈遠、幅員愈遼闊的時候，北魏作爲華夏正統的身分也就愈發強化。

酈道元在〈河水注〉中屢屢引用《漢書·西域傳》對西域各國之記載，同時概述漢代開通西域、置教尉屯田、設立都護等情況，不免使人聯想其似乎意有所指。自東漢末年以來，東西交通大衰，曹魏時雖說仍有龜茲、于闐、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諸國前來朝貢，但是西域已不能盡至。晉武帝泰始中及太康中，更是僅剩下康居、焉耆、龜茲、大宛、大秦等國來貢。五胡亂華之後，中西交通幾乎完全斷絕，直到北魏建立之後才又開始恢復中原與西域的外交關係。<sup>37</sup>恢復中西往來對北魏爭奪華夏正統有正面助益，因此繼酈道元之後，楊銜

<sup>35</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2774。

<sup>36</sup> 參見譚家健：〈酈道元思想初探〉，收錄於譚家健、李知文選注：《水經注選注》，頁 486。

<sup>37</sup> 據方豪研究統計：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車多螺、西天竺、舍衛、疊伏羅諸國遣使朝貢；宣武帝景明三年（502），疏勒、罽賓、婆羅捺、烏菴、阿喻阿喻陁、羅婆、不崙、陀拔羅、弗婆提斯、羅嚩舍、伏耆奚那太、羅槃、烏稽、悉萬斤、朱居槃、訶盤陁、撥斤、厭味、朱沱洛、南天竺、持沙那斯頭諸國遣使朝貢；景明四年（503），南天竺國朝貢；正始四年（504），疏勒、車勒、阿駒、南天竺、婆螺、半社、悉萬斤、可流、伽比沙、于闐諸國遣使朝貢；永平元年（508），南天竺國、罽賓遣使朝貢；永平二年（509），胡密、步就磨、忸密、槃是、悉萬斤、辛豆、那越、拔忸、疊伏螺、弗菩提、乾陁、咤波羅諸國遣使朝貢；永平三年（510），烏菴、伽秀沙尼遣使朝貢；永平四年（511），婆筆、幡彌、烏菴、比地、乾達、阿婆螺、達舍越、伽使蜜、不流沙、嚩嚩、朱居槃、波羅、莫伽陁、移婆僕螺、俱薩羅、舍彌、羅樂陁、婆筆、幡彌、烏菴、比地、乾達、難地諸國遣使朝貢；延昌三年（514），南天竺、佐越、費實諸國遣使朝貢；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地伏羅、罽賓遣使朝貢；神龜元年（518），波斯、疏勒、烏菴、龜茲諸國遣使朝貢；正光二年（521），烏菴遣使朝貢。參見氏著：《中西交通史》（上冊）（台北：中國文

之寫《洛陽伽藍記》特於卷末「聞義里」附錄《宋雲行紀》；魏收撰《魏書》承襲《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後漢書》的〈西域傳〉傳統，無非都是想藉由中西交通，及西域諸國的朝貢去凸顯北魏的正統地位。

酈道元這種建康的文化心態也反映在其對南方著作的不吝徵引，諸如東晉庾仲雍《湘州記》、伏滔《北征記》、羅含《湘中記》、袁松山《宜都記》、常璩《華陽國志》，劉宋盛弘之《荊州記》、郭緣生《述征記》、雷次宗《豫章記》、孔靈符《會稽記》、劉道真《錢唐記》、鄭緝之《東陽記》、王韶之《始興記》、段國《沙州記》，蕭齊劉澄之《永初記》等等。<sup>38</sup>其中又以常璩《華陽國志》一書最值得注意。任乃強指出：「《水經注》屢引常璩之書，有稱《華陽國記》者（《漾水》、《沫水》）兩處，稱《華陽記》者多處（卷三十三最多），他或稱「常璩曰」，或稱《巴漢志》，其文則皆今日通行之《華陽國志》文也。」<sup>39</sup>王師文進則進一步認為：「酈道元《水經注》的撰述與成書深受常璩《華陽國志》的啓發，常璩雖致力於保存巴蜀文化的工作，但卻未形成狹隘封閉的川蜀地域觀念／地方文化意識，反而能夠對於外來文化的刺激與影響給予比較正面價值的評價而盡可能地避免負面的批評，……猜想酈道元之所以比楊銜之對於南方文化更具包容性，很有可能便是繼承了常璩的這種宏觀視野與胸襟，因此比較能平心地看待地方與全國的緊張關係。」<sup>40</sup>

正因為酈道元有開闊的文化視野，所以對於南朝山水同好如謝靈運、吳均、鮑照等人的詩文作品更是如數家珍、視如己出，甚至還刻意模仿學習其寫作方式。錢鍾書曾以《水經注》的語言文字與南朝詩文相互對照，分析酈道元仿效南方作家之跡：

---

化大學出版部，1983年12月），頁186-194。

<sup>38</sup> 關於諸書簡介，可參考鮑遠航：《〈水經注〉的文獻學文學研究》第二章〈《水經注》所引文學性地記、史傳考〉，頁54-158。

<sup>39</sup> 見氏著：《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頁4。

<sup>40</sup> 見師著：〈北魏文士對南朝文化的兩種態度——以《洛陽伽藍記》與《水經注》為中心的初探〉註85，《臺大中學報》第二十四期，頁142。收錄於師著：《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

吳均《與施從事書》、《與朱元思書》、《與顧章書》……與酈道元《水經注》中寫景各節，輕倩之筆為刻畫之詞。」<sup>41</sup>按參觀論簡文帝《臨秋賦》。『水皆漂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按參觀《水經注·洧水》：『綠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矣』，又《夷水》：『虛映，俯視游魚，如乘空也』，『空』即『無礙』，而以『空』狀魚之『游』較以『無礙』狀人之『視』，更進一解。」<sup>42</sup>『夾岸高山，猶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按參觀鮑照《登大雷山與妹書》，《水經注》中乃成熟語，如《河水》：『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又《汝水》：『左右岫壑爭深，山阜競高』，又《灑水》：『雙峰共秀，競舉群峰之上。』<sup>43</sup>《與顧章書》：『森壁爭霞，孤峰限日』；按參觀《水經注·易水》：『南則秀嶂分霄，層崖刺天』，又《滄水》：『岫嶂高深，霞峰隱日』……吳、酈命意鑄詞，不特抗手，亦每如出一手焉。」<sup>41</sup>

由是觀之，《水經注》在藝術表現上的成就，應歸功於酈道元法式南朝山水詩，學習南方一流文學家的文字、語言、筆調、意境，誠如譚家健所云：「《水經注》的語言技巧，不少地方可以看出是吸取了當時山水詩的最新成就，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要數謝靈運和吳均。《水經注》中好幾處提到他們的詩文，個別語言甚至直接模仿吳均。其筆調談雅清綺又和謝朓類似，而意境開闊深邃則與鮑照相通。」<sup>42</sup>而正因為酈道元是站在洛陽古都、天下共主的絕對制高點進行文化思考，遂能革除漢魏以來北人視南方為禽鳥魚鱉之地的鄙視心理，轉而用詠歎自家鄉土的心情，詠吳地則「細魚奔迸，隨水登岸」、「蘆人漁子，泛濫滿焉」<sup>43</sup>；嘆蜀

<sup>41</sup> 見氏著：《管錐篇》第四冊（台北：書林出版社，1980年8月），頁1456-1457。

<sup>42</sup> 見氏著：〈試論水經注的文學成就〉，收錄於譚家健，李知文選注：《水經注選注》，頁9。

<sup>43</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3218、3331。

土亦「桑麻列植，佳饒水田」、「泉流所溉，盡為沃野」<sup>44</sup>，極言南方水土之沃美也。

總之，酈道元以山水審美的情懷為發端，歷經北魏孝文帝太和改革的洗禮，最終站上洛陽文化的鳥瞰高度，過濾掉南北文化之爭的負面情結及政治對立的意識型態，進而謙敬俯察四方風土民情，在以西漢版圖為架構的《水經注》中包括南北，視彼如己，不執著於地域限制，<sup>45</sup>因而開創出極大的地理空間美學與歷史文化格局。

假若非得回歸南北文化之爭的主題的話，或許可以這樣說：酈道元《水經注》在「夫唯不爭」的思維脈絡下，反倒跨越南北鴻溝，悄然納入南方疆土。這種間接的、隱藏的、迂迴的藝術手法，<sup>46</sup>對照南朝詩人動輒金戈鐵馬，作邊塞詩以爭漢家正統的情形，<sup>47</sup>格局似高之一等。

## 第二節 楊銜之的敵視與排拒

《洛陽伽藍記》對南北朝文化之爭的時代課題涉入頗深，歷來學者亦不乏討論，然卻極少將文本置於南北朝文化之爭的「歷史發展脈絡」加以考量。

楊銜之大約卒於武定八年（550）前後，推測他撰寫《洛陽伽藍記》的時間，應是在武定五年至七年（547-549）這二三年間，正是南北朝交聘遣使最熱絡，文化爭奪最劇烈的期間。此氛圍或許是造成楊銜之對南方文化疾言厲色的最關鍵

---

<sup>44</sup> 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頁 2333、2782。

<sup>45</sup> 譚家健〈酈道元思想初探〉：「酈道元沒有把當時南朝和北朝的國境線放在眼裡，書中沒有一個字說到哪條河、哪座山，哪座城是國境線分界所在。他曾經提到宋、齊與北魏通和所走的道路，卻很少談起北朝和南朝交戰的戰場（對於古代許多次大戰戰場，書中往往是要交代的）。」文章收錄在譚家健、李知文選注：《水經注選注》附錄一，頁 485。

<sup>46</sup> 羅洛·梅（Rollo May）曾說：「就某種意義而言，藝術必須具有侵略性。」見氏著；朱侃如譯：《權力與無知》（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7年11月），頁 184-185。

<sup>47</sup> 參見林郁迺：《南宋士人思維中的南朝影像》（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王文進先生指導，2003年6月），頁 67-75。

因素之一，也是楊銜之一再強調北魏正統地位的主因。<sup>48</sup>此外，也不能忽略在此期間東魏內部的政局發展，先是高歡病死，接著侯景叛魏，高澄遇刺喪命，這些事件勢必影響楊銜之的寫作心理。

以下將先行探究《洛陽伽藍記》寫作時期的南北交聘及文化之爭的情形，再揭示楊銜之在此時代氣氛下，同時面臨國家危急存亡之際，究竟如何看待南方地域文化，透過何種方式去維護北魏在華夏歷史文化傳承序列上的正統地位，以聚合北方人士的文化認同感。

## 壹、南北朝交聘場合的文化激鬥<sup>49</sup>

### （一）南北對峙下的交聘歷程概述

永嘉之亂後的北方幾乎淪為諸胡殺戮的戰場。前秦曾一度統一北方，然好景不長，因著苻堅南侵失利又喪其主導權，取而代之的是鮮卑拓拔氏部族。公元三百八十六年拓拔珪建立北魏，是為登國元年，不過當時北方仍有後秦、後燕、西燕、西秦等國，並未定於一尊，江南則為東晉，當時南北對峙的態勢並不明顯。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消滅北涼，統一北方，正式與篡晉而興的劉宋王朝形成南北交鋒的局面，數度爆發衝突、戰爭。縱使如此，南北遣使交聘的次數卻不減反增。

關於南、北政權之間的外交互動，早在東晉元帝大興四年（321）就曾派遣韓暢出使鮮卑拓拔部，欲加崇爵服，但卻被當時的部族領袖鬱律以其僭立江表而

---

<sup>48</sup> 意識型態是由歷史的與當代的環境所構成，在社會危機與緊張時特別容易產生，有助於人們避開生活上的不明確，而提供給人們確定性與安全感。人們透過他們的意識型態有選擇地「看」，無視於與他們的信仰相矛盾的事物，或以此方式來認知它，以使它與其信仰表現得一致相符，同時促成對自我的、社會的、國家的、民族的認同。參見參見恩格爾等著（Alan Engel etc）張明貴譯：《意識型態與現代政治》第一章〈政治意識型態：政治中的信仰與行動〉、（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3月），頁5-22。

<sup>49</sup> 本小節寫作頗受蔡宗憲《南北朝交聘與中古南北互動（三九六一五八九）》之啟發。該文對南北朝交聘的文獻史料蒐羅宏富，於本文有淵驅之功，特此致謝。（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陳弱水先生指導，2006年1月）。

加以拒絕。<sup>50</sup>直到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北魏黃始元年，396）起，北魏與東晉才開始有相互遣使的記錄，其中東晉多達九次，北魏則為三次。當時東晉有意拉攏北魏以制衡北方諸胡，是以外交遣使極為主動，而北魏也友善回應，如北魏天興二年（東晉隆安三年，399），就曾應東晉之請求，派兵援解姚興圍困洛陽之危。然而，北魏天賜元年（東晉元興三年，404），道武帝拓拔珪卻曾「詔尚書郎中公孫表使於江南，以觀桓玄之釁」<sup>51</sup>，可見雙方的盟友關係並不堅實，但大致還算平和。

劉宋時代（420～479）的南北關係在互有所圖的情形下漸趨緊張。劉宋原本繼承前朝與北魏的盟友關係以箝制夏國，不過當北魏聞知劉裕死訊後，認為有機可趁，竟不顧盟誓，揮軍攻取滑臺、虎牢等河南重鎮。當時劉宋陷於權臣徐羨之、謝晦、傅亮與王室劉義隆的鬥爭，無心捍衛疆土；北魏則遭逢明元帝拓拔嗣遽然辭世而政情不安，加上外有柔然寇邊，四周鄰國夏、燕、涼又虎視眈眈，亦無條件繼續南進，雙方只好遣使通和。元嘉六年（429）朝政回穩之後，宋文帝即以收復失地為由與北魏爆發一連串軍事衝突，並轉而與柔然、夏、涼、燕等北魏鄰國結盟，甚至元嘉七年還與夏聯合攻打北魏，北魏雖然力破宋、夏聯軍，但礙於外強環伺，亦不想擴大釁端，故再次遣使通好，化以禮誼。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再度興兵北伐，此時北魏早已蕩平諸胡，因而在無後顧之憂下屢次大敗宋軍，甚至渡淮臨江，震驚宋京，最終結果是宋文帝遣黃延年朝獻百牢，進貢請和。<sup>52</sup>泰始二年（466），宋明帝欲示威淮北，又興兵北討，<sup>53</sup>不料邊州刺史薛安居然叛降，反造成北魏趁勢大敗宋軍，宋明帝見大勢不利，急欲請和，卻未獲回應，直到泰始五年，北魏攻佔青、冀之後，才遣使通和。此後，南北歲通，交聘內容除了戰爭訊息的傳遞與媾和之外，更突破以往而開始有一些貿易談判及一般性通好。

---

<sup>50</sup> 參見魏收：《魏書·序紀》，頁 10。

<sup>51</sup> 參見魏收：《魏書·太祖紀第二》，頁 41。

<sup>52</sup> 參見魏收：《魏書·島夷·劉義隆傳》，頁 2139。

<sup>53</sup> 參見司馬光：《資治通鑑》第 131 卷、〈宋紀十三〉，頁 4123。

公元四七九年，蕭齊篡宋之後雖主動向北魏遣使示好，但北魏卻如蕭道成所料，利用南朝政局未定之際支援附降的劉宋宗室劉昶南攻。<sup>54</sup>結果魏軍不僅連番失利，蕭齊遠交柔然以掣肘北魏的策略又奏效，遂使北魏分身乏術，無力南侵，於是南北媾和，維持了十幾年的和平，直到孝文帝親政才又重燃南北戰火。蕭齊雖說國祚不長，然期間雙方遣使不輟，文化交流的深度與日遽增。

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統一吳會即成為北魏國策，不僅使南北關係進入前所未有的緊張，交聘亦為之中斷。宣武帝繼位之後不違父志，南北交戰頻仍。梁武帝蕭衍雖一再向北魏請和通好，但皆未獲善意回應，據《北史·董紹傳》記載：

董紹……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為賊鎖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暫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sup>55</sup>

蕭衍本欲趁遣返降人董紹的機會向北魏請和修好，但北魏態度卻極為強硬，主要是當時柔然勢力衰退，可專心對付南朝，故宣武帝竟以「衍辭雖款順，而不稱藩」<sup>56</sup>為由拒絕。直到北魏正光三年（梁普通三年，522），才又重啓睽違二十八載的交聘之門。不過隨著六鎮之亂的爆發，南北外交工作只能停擺。

東、西魏分裂之後，北朝無力南攻，蕭衍又主動議和，結果反而弔詭的成為南北朝交聘的高峰期。自五三七年（東魏天平四年、梁大同元年）至五四九年之

---

<sup>54</sup> 蕭道成早在篡宋之時，便料及北魏可能藉口出兵南朝，是以對當時的兗州刺史垣崇祖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鄙。壽陽當虜之衝，非卿無以制此虜也。」於是乃徙崇祖為豫州刺史。參見司馬光：《資治通鑑》第 135 卷、〈齊紀一〉，頁 4229。

<sup>55</sup> 見李延壽：《北史》，頁 1706。

<sup>56</sup> 見魏收：《魏書·島夷·蕭衍傳》，頁 2175。

間的十三年間，蕭梁與東魏互派使節加總多達三十二次，而五五〇年高齊篡魏之後，也互派使節有十五次之譜。是時南北暫歇兵戎，而轉戰外交場合，雙方精銳盡出，爭文鬥武，競相誇耀，不僅文化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南北意識型態壁壘也更勝以往。

## （二）南北外交場合的文化爭奪

北魏政權以鮮卑拓拔氏為主體，起初在漢人心中根本非關華夏，因此，樹立正統形象對北魏而言乃當務之急，故它開始積極與東晉通使的目的之一其實是爲了爭取政權合法性，<sup>57</sup>此與五胡諸國奉晉正朔，接受東晉策封，以成霸業的考量完全一致。<sup>58</sup>北魏跟南朝通使的重要目地之一既是爲了爭取華夏正統，那麼使節遴選自必須符合文化上國的形象，是以妙選行人，特派文學優瞻、容止可觀之士擔任，以求在交聘過程能增國之光，如游明根、盧玄等人都是傑出的外交官。儘管這些北魏使節表現傑出，但至多換來個人聲譽，對於南朝鄙視北魏的心理並無多大改變，仍以虜視之。<sup>59</sup>隨著孝文帝親政以後國勢日盛；遷鼎漢化更激勵北魏的文化自信，不僅自視爲華夏正統，甚至在宣武帝的觀念中蕭梁根本就應該要稱藩納貢，可見北魏是時已經縮短、扭轉初期與南朝的文化差距，形成南北相互抗衡的情況。因此，除了戰線上打打停停的軍事衝突外，非武力交鋒的外交場合亦成爲文化角力的擂臺，南北雙方精銳盡出，期於壇坫周旋之際壓過對方，維護國家尊嚴，如趙翼所言：

南北通好，嘗藉使命增國之光，必妙選行人，擇其容止可觀，文學優瞻者，以充聘使。……南北交聘，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此等猶不過以言語文學見長，無大關係，若事涉朝

---

<sup>57</sup> 參見梁滿倉：《漢唐間政治與文化探索》（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頁306。

<sup>58</sup> 參見黎虎：〈六朝時期江左與東北地區的交通〉，收錄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7月），頁437。

<sup>59</sup> 參見梁滿倉：《漢唐間政治與文化探索》，頁309-310。

政邊事，而能以片言全國體，折敵謀，則尤有足尚者。……能為國家折衝樽俎之間，使鄰國不敢輕視。<sup>60</sup>

南北朝雙方從聘使的遴選、從吏與隨附者的選派、甚至接待聘使的主客官員都是經過精挑細選，必須才第、文學、辭令皆有可觀，才符合外交官的標準。<sup>61</sup>正因交聘雙方都是「妙簡聘使」<sup>62</sup>、「盛選行人」<sup>63</sup>，加上「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sup>64</sup>，「妙選朝士有辭辯者」<sup>65</sup>擔任之緣故，故於折衝樽俎之際每每上演唇槍舌劍，在政治文化正統的辯論上自我矜大。<sup>66</sup>

交聘是對等的外交關係，注重禮尚往來，但在文化意識型態的作祟下，聘使經常都會出現貶損對方的言辭。基於禮儀與友好的緣故，仍須盡量避免失禮的言談，於是外交辭令就在你來我往、明褒暗貶之間被發揮到極致，其中爭辯最劇烈的主題即是正統問題，而辯論內容則集中在族源關係、地理位置、歷史文化與政治繼承等方面。

《魏書》記載南齊劉纘出使北魏，與魏主客令李安世言語交鋒的過程：

蕭蹟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

---

<sup>60</sup> 見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為重條」，頁 235-238。

<sup>61</sup> 關於交聘人員的遴選詳參蔡宗憲：《南北朝交聘與中古南北互動（三九六一五八九）》第二章〈交聘人員的遴選與交聘流程〉，頁 41-86。

<sup>62</sup> 見李延壽：《北史·邢紹傳》，頁 1591。

<sup>63</sup> 見魏收：《魏書·李平傳》，頁 1460。

<sup>64</sup> 見李百藥：《北齊書·祖孝隱傳》，頁 521。

<sup>65</sup> 見李延壽：《南史·范岫傳》（台北：鼎文書局，1998 年 11 月），頁 1468。

<sup>66</sup> 黎虎指出：我國古代外交在南北朝時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其突出表現之一是南北雙方以文化、學術為外交爭奪的手段，尤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漢化成功之後更為突出，北朝對主客郎的人選就特別注重學識和才具，南朝更是如此。南朝政權一向以文化、學術陵轢北朝，而隨著北方文化、學術水平的提高，更是不容北朝在外交領域的文化、學術鬥爭中占上風，故其選拔博學高才出任主客郎更是不遺餘力。參見氏著：《漢唐外交制度史》（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 年 4 月），頁 183-184。

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sup>67</sup>

以劉纘為首的南朝使臣從一開始便語帶嘲諷，故意稱呼安世為「典客」，而不以當時官名「主客」稱之。蓋秦政暴亂，不過二世，華夏正統的繼承脈絡中本有「擯秦」而直承周、漢的主張。劉纘以秦朝官名稱呼安世無非話裡藏刀，暗指北魏不具正統資格。安世隨即聽出劉纘話中之意而嚴加駁斥並反唇相譏。劉纘自然不甘示弱而纘指方山問燕然之遠近，意指鮮卑氏族原居漠北，不能位居華夏正統。但見安世氣定神閒的回應：方山與燕然的情況就像石頭（建康城）之於番禺（今廣州市境內），反譏南朝僻居江外，無異於化外之民。

《陳書》記載梁使徐陵出使東魏與主客魏收互相揶揄的情形，頗令人莞爾：

（徐陵）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sup>68</sup>

魏收以天氣炎熱為引借題發揮，從南北地理位置去消遣來客徐常侍，但見徐陵機敏過人，話鋒一轉，巧妙地轉以文化禮儀傷彼要害，反使魏收下不了臺。藉著自然氣候大作文章的，尚有東魏聘使李諧與梁主客郎范胥的言語攻防：

孝靜初，……蕭衍求通和好，朝廷盛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常侍，為聘使主。

<sup>67</sup> 見魏收：《魏書·李孝伯傳附安世傳》，頁 1175。

<sup>68</sup> 見姚思廉：《陳書·徐陵傳》（台北：鼎文書局，1998 年 10 月），頁 326。

諧至石頭，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諧問胥曰：「主客在郎官幾時？」胥答曰：「我本訓胄虎門，適復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為郎。」胥答曰：「特為應接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己濟務，誠得事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答曰：「自顧菲薄，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胥問曰：「今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諧答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諧答曰：「不常厥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胥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何為而遷？」諧答：「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乃是俳諧，亦何足道！」<sup>69</sup>

李諧首先貌似有禮地寒暄，其實是明知還故問范胥在朝為官之情況，滴咕「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為郎」，虛情假意地為范胥叫屈，實則暗批南朝職官制度失序。范胥當然不是省油的燈，他先是謙和地稍做解釋，回答是為了解應接遠賓，才權充主客郎，並表示自己菲薄，尚恐能力不足勝任，豈敢抱屈。至此話鋒一轉，隨即暗指北方氣候寒冷，不若南方溫和，刻意凸顯南方地域之優越性。李諧一聽馬上正色說明北朝所在之地理位置是得「陰陽之正」，寒暑切合時宜，微言反諷南朝陋居江左。范胥自然不甘示弱，馬上明言鄴都並非可以測影修曆之地。李諧則辯稱鄴、洛皆皇居帝里，且二城之距離也不遠，自可繼得洛陽正統。豈知范胥不肯善罷干休，再舉殷人遷都為例質疑北朝京都遷鄴的原因。在此短兵相接的尖銳提問之下，李諧只能以「不常厥邑」、「相時而動」等遁辭、詭辯勉強招架。

---

<sup>69</sup> 見魏收：《魏書·李諧傳》，頁 1460-1461。

辯論至此，范胥可謂占盡上風，因而開始得意忘形，大言不慚地標榜南朝有「金陵王氣」、「黃旗紫蓋」，結果反而被李諧逮到逆勢扭轉的契機，立即抓住范胥的謬失予以反擊，質疑南方符命之說的數量豈能和中國比隆，進而嚴詞糾謬，指斥范胥盡說俳諧無稽之談。

另外，由於南朝初期政權不穩固，因而時有篡奪或違背政治倫理之事發生，此亦屢成外交中北朝消遣南朝的話題。例如：蕭齊車僧朗出使北魏時便曾遭難：「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天位？」<sup>70</sup>庾蕞、何憲、邢宗慶等人聘魏亦曾被成淹嘲笑「齊先主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sup>71</sup>而相顧失色。後來北魏孝文帝南伐亦曾臨陣質難齊將崔慶遠：「齊主廢立，有其例不？」<sup>72</sup>可見南朝皇室亂象幾乎成爲外交論辯上的一大破口。

除了爭奪政治正統的談辯，其他諸如禮儀制度、南北人才等方面的較量亦是鬥智鬥力，抑敵揚己。南北雙方在強烈的地域政治文化本位主義驅使之下，必想盡辦法折服對手而後快。禮儀制度是文化的客觀形現，制度合理與否不止涉及文化素養問題，亦影響雙方國格地位尊卑及行人班次的外交儀節，此背後又隱含著南北政治正統的角力。因此，南北聘使對於外交禮儀時有精彩的論辯。《魏書》記載：

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頤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敕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

<sup>70</sup> 見蕭子顯：《南齊書·魏虜傳》，頁 988。

<sup>71</sup> 見李延壽：《北史·成淹傳》，頁 1699。

<sup>72</sup> 見蕭子顯：《南齊書·宗室傳·始安貞王道生·遙昌》，頁 793。

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僚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間衣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齋袴褶，比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孤，自當直筆。<sup>73</sup>

太和十四（490）年九月，文明太后去世，翌年二月南齊裴昭明與謝峻按照當時的外交成規，穿著朝服前往弔喪，卻被魏廷官員制止，要求必須著以素服方能行弔，因而引發辭辯。雙方引經據典，互有攻防，最後裴昭明不敵成淹，只好屈從，向魏廷商借弔服。按喪期禮數，帝家之喪，踰月即葬，葬而即吉，不必終喪，漢魏以來皆如此行，可是孝文帝卻堅持要守喪三年，羣臣恐其耽誤國政，紛紛勸阻。<sup>74</sup>裴昭明原先堅持以朝服行弔其實合乎禮儀，但是卻因言辭失辯而折節受辱。事件並未就此落幕，事隔三月之後，北魏回聘南齊，雙方又為此再度交鋒：

（李彪）使於蕭蹟。蹟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齊主既賜讌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自喪禮廢替，

<sup>73</sup> 見魏收：《魏書·成淹傳》，頁 1751-1752。

<sup>74</sup> 見魏收：《魏書·禮志》，頁 2777-2778。

於茲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此，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辭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執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為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謂亡禮之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載籍：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五霸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sup>75</sup>

劉繪原欲藉北魏喪禮失節羞辱李彪，不料李彪竟雄辯滔滔，隨狀應答，最後還不忘標榜北魏君臣能應變於古禮與現實需要之間，足以媲美三王五帝之盛。

論及南北人才之較量，《魏書》記載公元五三七年，蕭梁與東魏初次通和，李諧出使南朝而與蕭衍相互談論的情形：

蕭衍親問諧曰：「魏朝人士，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庸短造次，無以備啟。」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衍曰：「若爾，文足標異、武有冠絕者，便可指陳。」諧曰：「大丞相勃海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懸衡四海。錄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儁，宗室之秀，綰政朝端。」

---

<sup>75</sup> 見魏收：《魏書·李彪傳》，頁 1389-1390。

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時譽民英，戮力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勳賢忠亮，宣讚王猷。自餘才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言。」<sup>76</sup>

蕭衍以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爲引，諮詢李諧東魏各式人才，頗有挑釁之意味。李諧不卑不抗、層次井然地分類舉例，說明東魏文武濟濟，可擬成周。蕭衍聽畢隨即語帶嘲諷說李諧所言深不可測，又說東魏既如此多士，這些賢臣就該輔弼幼主，永固基業，蓋有諷刺諸臣各懷鬼胎，多有謀朝篡政之心的意味。又如《梁書》記載：

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使中書舍人朱异接之，預讌者皆歸化北人。善明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對曰：「异所以得接賓宴者，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啟，敕即使於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未嘗訪彼一事，善明甚相歎挹。佗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sup>77</sup>

北魏聘使劉善明自負才氣，因而語帶挑釁地詢問南朝人才之情況。梁主客朱异不僅不接受善明不懷好意的賞譽，並申明外交目的著重兩國親好，而非才辯相尚，否則自己根本不夠資格擔任迎賓的任務，言下意指南朝人才濟濟。善明聽完朱异的話仍舊不肯善罷干休，非得與南朝人才較量一番，於是又與王錫、張纘較量經史，南北人才瑜亮相爭可見一斑。

除了上述這些比較敏感的政治性議題之外，南北之間可以論辯的話題尚有許

<sup>76</sup> 見魏收：《魏書·李諧傳》，頁 1461。

<sup>77</sup> 見姚思廉：《梁書·王錫傳》（台北：鼎文書局，1999 年 5 月），頁 326。

多，諸如學術立場、土風物產等等，也都是雙方使節互爭長短的談資。在經義詮解方面，南、北朝分別以鄭玄、王肅為旨歸。《魏書》記載，東平四年李業興偕同李諧、盧元明出使蕭梁，與梁主客朱异曾就經義進行商榷：

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北間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日，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日也？」异遂不答。<sup>78</sup>

由於南北朝學術立場不同，因而對南郊與圓丘的祭祀位置在認知上有所分歧，甚至還引發喪服期間嫁娶的禮儀問題，並對王義、鄭解進行優劣辯論。這類言辭交鋒的背後，其實隱含著一種地方意識型態的競爭心理，演變到後來，就連土風物產亦是當時互相競誇的題材。其中《魏書》記載：

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慚而罷。<sup>79</sup>

南齊劉纘出使北魏，主客郎李安世帶劉纘去逛買賣金玉的市集，但市面所售之物卻是魏廷事先安排，取大內珍寶交付富賈，令其互相買賣，僅是為了在南朝來使面前製造北魏富饒，視黃金如瓦礫的假象。南北外交惡鬥至此，令人莞爾。

---

<sup>78</sup> 見魏收：《魏收·儒林傳·李業興》，頁 1862-1863。

<sup>79</sup> 見魏收：《魏書·李孝伯傳附安世傳》，頁 1175。

## 貳、楊銜之對南方地域文化的排拒

社會學大師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提出「知識與社會情境關連論」，認為知識乃至於社會思潮的產生皆受到社會情境制約，人類思想的意識型態成分，總是與思想家既存的生活情境結合。<sup>80</sup>公元五三七至五四八這十二年間，是南北交聘最頻仍的時期，雙方互相遣使至少三十二次，平均一年將近三次，往來密集度居南北朝各時期之冠，<sup>81</sup>雙方的文化競爭也最為激烈。而期間高歡病死、侯景叛魏、高澄遇刺等重大歷史事件，更使東魏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社會危機，楊銜之就是在此社會情境下寫作《洛陽伽藍記》的，以致於在文化心態上對南方充滿敵視，形成激進的北朝本位主義者，此亦為當時北朝集體意識型態（group ideology）<sup>82</sup>的呈現。

楊銜之對南方文化的不友善，集中反映在卷二「景寧寺」中所記載的一場南北人酒宴中，這段記錄可說是繼左思《三都賦》後，兩三百年間北人所寫最為激進的一段文字，堪稱南北文化之爭的經典之作。<sup>83</sup>茲將全文分段摘錄並依序分析，以見事件之始末及其思維內涵：

（張）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景明年初，從蕭寶夤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為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為魚鼈市也。景仁住此以為恥，遂徙居孝義里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褰裳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

---

<sup>80</sup> 參見曼海姆（Karl Mannheim）著；張明貴譯：《意識型態與烏托邦》（Ideologie und Utopie）〈譯序〉（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6年2月），頁iii。

<sup>81</sup> 參見蔡宗憲《南北朝交聘與中古南北互動（三九六一五八九）》，頁182。

<sup>82</sup> 參見曼海姆（Karl Mannheim）著；張明貴譯：《意識型態與烏托邦》，頁52。

<sup>83</sup> 參見王師文進：〈三分歸晉前後的文化宣言——從左思〈三都賦〉談南北文化之爭〉，註釋38。《漢學研究集刊》第1期（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2005年12月），頁27-48。收錄於師著：《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

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慶之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坐。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响是中原士族。

楊銜之首先說明主人家張景仁是隨從蕭寶夤歸正的南方人士，而由於當時魏廷招納遠人的政策，是以手無寸功也能高官厚祿，語意之間對這位「吳兒」頗為輕蔑。從張景仁恥居魚鼈市而尋遷孝義里，亦可看出南人入洛之後面對北人眼光的心理壓力。永安二年蕭衍指派陳慶之送北海王元顥入洛僭帝，景仁與慶之原係南朝舊識，遂設宴款待，席間有南北人士數人作陪。不料酒過三巡之後，南北文化衝突旋即展開：

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濕墊，攢育蟲蟻，疆土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羣。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難言，不可改變。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見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婿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癭之為醜。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為鎮，四海為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凌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何為不遜，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詞雅句，縱橫奔發；杜口流汗，合聲不言。

先是陳慶之從「族源」與「器物」的角度指出北魏欲稱正統的謬思，結果楊元慎立即用「地理空間」的佔有質疑南朝苟延殘喘、僻居一隅，南方不但土地潮濕，又多蟲蟻、瘴癘之氣；最離譜的是蛙黽共穴、人鳥雜居，加上居民斷髮紋身，浮

沈於三江五湖，完全未賓王化，不染中原禮樂的氣息，形同化外民族，這才不斷發生劉劭弑父篡逆、劉駿淫穢其生母等罔顧人倫的醜事，更不用說山陰公主請婿賣夫，與男妾群聚淫亂。楊元慎說完之後，隨即話鋒一轉，除了指斥陳慶之因久沐南風而不知箇中醜陋，更強調北魏受命於天，定鼎嵩洛，不僅與五帝並跡，禮樂憲章更是凌駕百代，境內有五嶽鎮護，四海為其腹地。最後更嚴責陳慶之既慕義來朝，即便魚鼈也已食用北方食糧，何以出言不遜。陳慶之等人聽完楊元慎一席話，竟然啞口無言。

最耐人尋味的是，楊元慎明明對陳慶之等人口不擇言，極盡侮辱之能事，但楊銜之竟以「清詞雅句，縱橫奔發」盛讚楊元慎，實在有違常理，可見其態度立場與楊元慎一致。<sup>84</sup>楊銜之緊接著記載：

於後數日，慶之遇病，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遂憑元慎。元慎即口含水噴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為飴，茗飲作漿。呷啜蓴羹，啜嚼蟹黃。手把荳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手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頭猶脩，網魚漉鼈，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拮拾雞頭，蛙羹蚌臙，以為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波遡浪，唵嗎沈浮。白苧起舞，揚波發謳。急手速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語。

林文月先生指出：「陳慶之方見辱於宴席上，數日後是否又請楊元慎為之解病？此事頗可疑，但作者藉此又對南人展開另一次更猛烈的謾罵，對於南人的語言習慣、衣食娛樂等，極盡嘲諷之能事，雖文字採四言韻語之美文形式，而內容實充滿苛刻輕蔑之語氣。風俗習慣常因地域有別，並無高下之差，但元慎藉祛病之咒

---

<sup>84</sup> 參見林文月先生：〈洛陽伽藍記的冷筆與熱筆〉，收錄於氏著：《中古文學論叢》（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6月），頁282。

語而得逞口舌之快，全面貶低南方文化，則愈見其偏見之甚，至於楊銜之對此則故事記載如此之詳，其用意何在，亦不能不令人感覺詫異了。」<sup>85</sup> 陳慶之其人其事見錄於《梁書》、《南史》，乃是一位驍勇善戰的南朝猛將，史稱「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故當時洛中有童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慶之麾下悉著白袍）。<sup>86</sup>但是這位南朝猛將來到楊銜之的筆下，竟然變成懦弱無能之輩，除與楊元慎論辯屈居下風之外，更一再受其奚落凌辱。並且楊元慎這號人物之虛實尚待考察，其根本不見於史籍，僅《洛陽伽藍記》「景寧寺」略繫斯傳。王師文進即云：「楊銜之對於空間文物的考證精神，居然在寫南北人物的時候，有這麼撲朔迷離的手法，這是很耐人尋味的事。當然我們仍然可以把這件事解釋成：流傳在當時洛陽城的軼聞。既然陳慶之的神勇可以製造出洛陽民謠，那麼在樹大招風之下，忌恨他的洛陽人士故意扭曲他的事蹟，也並非不可能。不過如果再證之楊銜之在卷二明懸尼寺中對南人的態度，我們寧可相信楊銜之在這方面扮演著相當積極的角色。」<sup>87</sup>

卷二「明懸尼寺」記載建春門外石橋，注云：

穀水周圍遠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頽橋，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銜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為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sup>88</sup>

<sup>85</sup> 見氏著：〈洛陽伽藍記的冷筆與熱筆〉，收錄於氏著：《中古文學論叢》，頁 283。

<sup>86</sup> 參見李延壽：《南史·陳慶之傳》，頁 1499。

<sup>87</sup> 見師著：《淨土上的烽煙——洛陽伽藍記》，頁 150。

<sup>88</sup> 見楊勇：《洛陽伽藍記校箋》，頁 70。

僅僅只是因為戴延之與劉澄之這兩個「南方人」的無心之過，一時不查將石橋建造的年代誤記為太康元年，此無關宏旨，楊銜之居然就小題大作，嚴詞痛斥戴、劉二人穿鑿附會，誤我後學，極為苛求。關於此事，楊銜之在同卷「魏昌尼寺」又補記一次：

魏昌尼寺，闕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即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臨東石橋，此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造，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蓋見〈北橋銘〉，因而以橋為太康初造也。<sup>89</sup>

林文月先生言：「劉澄之是南齊人，戴延之為東晉人，他們的記述有誤，固宜予糾正，但楊銜之稱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而指斥甚嚴厲，且又含有輕蔑之語調，則恐怕不單純為指正而已，其間似又牽涉地域性，甚至於政治性的對立立場使然。」<sup>90</sup> 北朝社會在地域情結作祟之下不僅對南方人士甚無好感，甚至連「南」這個字眼也賦予負面評價。卷三「高陽王寺」注云：

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裡，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才曰：「何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台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sup>91</sup>

從李才譏笑荀子文居於有四夷館座落其區的城南，可知當時洛陽城中的地理區域

---

<sup>89</sup> 見楊勇：《洛陽伽藍記校箋》，頁 81。

<sup>90</sup> 見氏著：〈洛陽伽藍記的冷筆與熱筆〉，收錄於氏著：《中古文學論叢》，頁 286。

<sup>91</sup> 見楊勇：《洛陽伽藍記校箋》，頁 156。

分配在一般百姓心中也有高下分別。而荀子文回答李才的譴詞用句，改「南」字爲「陽」字，更「城南」爲「國陽勝地」，可見時人心中根深柢固的南北歧見。同卷「報德寺」曾論及南北飲食習性，其中頗能傳達作者的文化立場：

（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以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瓦，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知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爲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義意，答曰：「下官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元義與舉坐之客皆笑焉。<sup>92</sup>

從與會朝臣的談論中，可以看出北朝社會充斥著對南方地域文化的偏見，尤其以

---

<sup>92</sup> 見楊勇：《洛陽伽藍記校箋》，頁 136。

王肅地位之崇高，居然也會遭受北人無禮揶揄，南方人士在北方社會的生存不易可見一斑。北人動輒呼來奔之南人爲「吳兒」，稱其居地爲「魚鼈市」，辱其茗飲爲「酪奴」，貶其魚食爲「邾莒」，經常在各式場合，利用南北風俗習性的差異性嘲諷南方人。唯從引文中可見孝文帝志在南北政治文化大一統，故於地域風俗之殊別有比較寬容的調和之論，此亦爲太和文治時期之基調。

楊銜之雖嚮往高祖太和文治期間的政治氣氛與文化精神，<sup>93</sup>但生不逢時，根本無從體會孝文帝當年「學在四夷」的文化格局，所以也未能如恭逢盛世的酈道元一樣用包容尊重的態度去對待地方文化。畢竟楊銜之任官之世已然進入京師遷鄴的東魏時期，北朝臣民的政治文化認同正在經歷著極大的威脅。而這時候記憶就成爲一種保存身分認同感的有力工具，故楊銜之毅然寫下其「記憶」去抵抗即將滅絕的歷史事實和被野心家刻意抹拭的歷史場景。<sup>94</sup>然而，也因爲歷史文化使命感的過度驅使，使楊銜之在面對外部衝突時信念倍增，以致於成爲一個激烈的北朝本位主義者。不過，由於楊銜之對南方文化的敵意是基於對北魏洛陽文化(新

---

<sup>93</sup> 據王師文進的統計分析：「高祖孝文帝在全書中十見。兩次在序文中，只提到太和十七年初，遷洛陽詔令穆亮營造宮室，以及承明門名稱由來的典故。第三次是在卷一永寧寺條中，提到中書舍人常景爲高祖拔識之事。第四次是在卷一瑤光寺條中，提及高祖在西遊園中造涼風觀一事。第五次亦在瑤光寺條中，提及高祖在金鏞城內作光極殿一事。第六次是在卷二明懸尼寺條中，提到寺東有一座晉朝的「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場，後來成爲儲放天下貢賦的地方。第七次是在卷三報德寺條中，提到魏文帝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高祖題爲勸學里事。第八次同在報德寺條中，提及高祖遷都洛邑，王肅獻策之事。第九次亦同在報德寺條中，提及高祖賜宴，和王肅談羊肉魚羹、酪漿茗飲南北飲食的問題，以及和羣臣猜字作詩的盛會之事，充分顯示北魏君臣之間藝術的品味及文思的流暢。第十次是在卷五凝玄寺條中，提及高祖將洛陽城東北，昔日殷頑民居所所稱名爲閭義里之事。在這十次記載中，楊銜之的確將高祖視爲文化的象徵，所述之事皆與典章文物有關，絲毫未涉及有關政事之筆。由此可以看出楊銜之心目中的洛陽太和時期，盡是一片文物雍容景象。」見師著：《淨土上的烽煙——洛陽伽藍記》，頁 89。

<sup>94</sup> 案：「凡是政治認同受到威脅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種抵抗滅絕和抹拭的方法。文化是「記憶」抵抗「遺忘」的一種方式。」「米蘭·昆德拉在他的小說《笑忘書》裡說：『人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鬥爭。』……記憶是一種保存身分認同感的有力集體工具，它不只可以透過官方論述漢書本來保存，也可以透過非正式的記憶來保存，那是抵抗歷史被擦拭的一座要塞，是抵抗的一種方法。」見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巴薩米安(David Barsamian)著；梁永安譯：《文化與抵抗》(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8月)，頁 159、210-211。

漢文化)的歸屬感,所以這種衝突情緒對於南北朝文化交融的走勢未必是破壞性的,西方社會衝突理論即認為雙方以共同承認(漢文化)的基本目的為基礎的衝突往往帶有一種整合效果,<sup>95</sup>這種「共有衝突」其實有利於爾後文化的交融。因此,楊銜之雖然對北上入洛的南方人士多有調侃,但最終仍在洛陽強勢文化的認知下將其整合進北方社會之中,接納他們成為新洛陽人。就此而言,楊銜之對於北方文化的執著反而意外帶來整合的契機。

### 第三節 魏收的史論及其文學表現之矛盾

魏收受詔撰寫國史始於東魏孝靜帝武定二年(544),但正式撰寫《魏書》則是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至五年間(552~554)。是時北齊國勢日盛,而南朝則疲於侯景亂梁(548~552),期間更有宗室鬪牆、諸王傾軋,不斷內耗的結果,形成前所未見的,南朝向北朝稱藩納貢以求自保的現象。承聖元年(552)十二月梁元帝蕭繹遷都江陵,<sup>96</sup>更形同放棄建康城兩百多年歷史文化傳承的正統圖騰,遂使魏收可以無所顧忌地褒貶南北歷史文化、振振有詞地強調魏、齊一系才是唯一華夏歷史政治文化正統傳承,至於南方諸朝只是齷齪邊鄙的偽政權。

魏收雖然在歷史敘事上對南方文化展現極強硬的態度立場,但是其內心深層的文化心理卻顯然心儀南方文化,而此矛盾心理相信不只是魏收個人的,其多少也反應了北朝文士對江左文采的嚮慕之情。

#### 壹、表現在歷史敘事上的強硬立場

魏收纂修《魏書》的期間適值北齊政治文化發展的全盛期。齊文宣帝高洋自

---

<sup>95</sup> 參見科塞(Lewis A. Coser)著;孫立平等譯:《社會衝突的功能》(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2月),頁77。

<sup>96</sup> 梁元帝選擇放棄建康而改以立都江陵,有其對於荆州的私人情感、政治現實考量及「洲滿百,出天子」的帝王運命傳說,詳參王師文進:《荆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林文月先生指導,1987年12月),頁13-19。

幼受漢人教育，故不僅重用漢人，也重視文化傳統和典章文物，如祭孔、修理學校、國子學生照北魏舊例銓補、將蔡邕所書石經殘片移至學館以利保存、重視史學等等皆可證明其漢化頗深，而其他政治、軍事上的才華更不在話下。因此，高洋即位的前六年（天保元年至天保六年），不僅國鼎昌盛，更是京師遷鄴以來鮮卑繼續漢化最有進展的時期。是時百工繁盛，庶物豐饒，正如《北齊書·後主紀·魏徵總論》所言：「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眾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sup>97</sup>可惜天保七年以後高洋疑似精神出現狀況，<sup>98</sup>北齊也自此走向衰頹。

魏收修史期間北齊國力攀升，南朝內亂不止，諸梁王甚至向北齊稱臣納貢。因此，魏收自能以上國之姿對藩屬國品頭論足，嘲斥南朝為「島夷」。相較於過去南朝自居華夏衣冠，《宋書》、《南齊書》動輒呼北魏為「索虜」、「魏虜」的情況，可謂易地而處。本文以下將分別藉由四個方面觀察魏收對於南方文化所採取的敘事策略：

### （一）以〈偽晉司馬叡傳〉及〈島夷列傳〉直斥南朝是偽政權

從〈偽晉司馬叡傳〉對東晉政權之記載與評價，以及涉及南方文化的遣詞用字觀之，魏收的態度立場相當明顯：

---

<sup>97</sup> 李百藥：《北齊書》（台北：鼎文書局，1998年10月），頁116。

<sup>98</sup> 熊德基研究指出，高洋即位之後酒色過度，以致於大腦皮質受到損害，加上內部接班繼位之壓力（猜忌諸弟），終於釀成躁狂抑悞型精神病。參見氏著：〈鮮卑漢化與北朝三姓的興亡〉，收錄於氏著：《六朝史考實》（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7月），頁139-143。據《北齊書·文宣帝紀》記載：「（高洋）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刀張弓，遊於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駝牛驢，不施鞍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馳騁，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嫗，分付從官，朝夕臨視，以為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沉醜既久，彌以狂惑，至於末年，每言見諸鬼物，亦云聞異音聲。……」，頁67-68。

平文帝初，叡自稱晉王，……叡僭即大位，改為大興元年。其朝廷之儀，都邑之制，皆準模王者，擬議中國。遂都於丹陽，因孫權之舊所，即禹貢揚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陽鳥攸居，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所謂「島夷卉服」者也。……春秋時為吳越之地。吳越僭號稱王，僻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公巫臣竊妻以奔，教其軍陣，然後乃知戰伐。由是晚與中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盛飾子女以招遊客，此其土風也。……漢末大亂，孫權遂與劉備分據吳蜀。權阻長江，殆天地所以限內外也。叡因擾亂，跨而有之。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為貉子，若狐貉類云。巴、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鼈，嗜慾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陸種，以罟網為業。機巧趨利，恩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饑寒。地既暑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蟲、蛇虺之害，無所不有。……

（叡）遣使韓暢浮海來請通和。平文皇帝以其僭立江表，拒不納之。<sup>99</sup>

以下分解這段引文：

- （一）當時中原的紛擾根本與拓拔氏族無關，但魏收開篇就將司馬叡政權繫在北魏平文帝鬱律之下，文末又以東晉欲遣使通和卻遭平文帝以其僭偽而拒絕一事作結，無疑是爲了凸顯北魏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力。
- （二）魏收強調東晉國都丹陽位於禹貢揚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屬於「島夷卉服」的蠻荒之地。
- （三）舉春秋吳越、漢末吳蜀爲例，說明南方地區向爲偽政權的發源地，司馬叡正是這種趁亂而起的偽政權。
- （四）從禮樂文化質疑江東僻遠一隅，根本不聞華土，以致於俗氣輕急、不識禮教，故中原冠帶稱呼江東人爲貉子，以凸顯北方才是真正華夏衣

---

<sup>99</sup> 見魏收：《魏書》，頁 2092-2093。

冠。

(五) 談南方風土則巴、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鼈，嗜慾皆異；地既暑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蟲、蛇虺之害，無所不有；論當地民情則云機巧趨利，恩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饑寒。<sup>100</sup>

事實上，地理想像經常受制於特定的政治議題與認同感而形成「地緣政治論述」，進而將空間區分為「我們的」地方和「他們的」地方，藉此區隔人我之異同。<sup>101</sup>魏收的地域偏見 (prejudice) 可謂遙契左思《三都賦》對吳、蜀二都的貶抑，而與同時代人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卷二「景寧寺」中對南方文化的批評更是如出一轍。可見北方人士對南方地域文化的歧視 (discrimination)<sup>102</sup> 長期以來並無多大改變。

期間雖然因為永嘉之亂，晉璽南遷，神州陸沉，北人不免垂頭喪氣，但是隨著歷史進入北魏洛陽時期，北朝正統論述奮袂而起，北齊又能使南朝俯首稱臣的局面之下，魏收理所當然視東晉諸君為僭立，並以北朝年號作為東晉南朝的紀元，以下舉《魏書》對東晉安帝之記載為例：

(北魏道武帝) 皇始元年，昌明死，子德宗僭立。……是年冬，德宗遣使

---

<sup>100</sup> 魏收此言雖有嚴重偏見，然亦非全屬無稽之談。明代地理學家王士性曾指出「六代繁華雖古今無比，然亦止於建康一隅而止，吳、越風氣未盡開也。」區域經濟史專家程民生亦認為：東晉時期的南方大部分地區都沒有開發，草木旺盛，沼澤遍佈，一派荒蕪，人煙稀少，百姓經常食不果腹，衣不遮體。參見氏著：《中國北方經濟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頁164-165。

<sup>101</sup> 參見：〈批判的地緣政治〉，Joanne P. Sharp，方淑惠譯，王志弘校訂，收錄於Paul Cloke, Philip Crag, Mark Goodwin編；王志弘等譯：《人文地理學概論》，頁248。

<sup>102</sup> 關於「偏見」與「歧視」的內涵，偏見 (prejudice) 是一種常見的否定性態度，是指對某種特定群體或某類成員持有某種否定性的消極認識和態度，這種認識和態度又總是缺乏充分的事實依據而有其認知的、情感的及行為的成分；歧視 (discrimination) 則是指由偏見的認識和態度引起的，直接指向偏見的目標或受害者的哪些否定性的消極的行為表現，可以說是偏見的具體化和外顯化。參見陳昌文、鐘玉英、奉春梅、周瑾、顏炯合著：《社會心理學》(台北：新文京開發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10月)，頁206-207。

朝貢，并乞師請討姚興。二年夏，德宗又遣使朝貢。

（北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十月，德宗遣使朝京師。

（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德宗遣廣武將軍玄文、石齊朝貢。<sup>103</sup>

魏收對東晉向北魏朝貢事記錄甚詳，自有其強調北朝正統的政治意識型態。而最耐人尋味的是，魏收在〈僭晉司馬叡傳〉末居然出現如是之論：

自叡之僭江南，至於德文之死，君弱臣強，不相羈制，賞罰號令，皆出權寵，危亡廢奪，釁故相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sup>104</sup>

一句「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的評語，幾乎將東晉視為蠻夷之邦、未沾禮樂的化外之民。而於〈僭晉司馬叡、竇李雄傳〉的總評，「史臣曰」的地方亦云：

司馬叡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跼天躋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sup>105</sup>

若讀者不察《魏書》是一本以少數民族政權為記載主體的史書，以魏收如此言之鑿鑿，東晉可真成了蠻夷小盜了。

東晉在《魏書》的書寫架構下既已成盜，那麼上繼晉統而來的劉宋、蕭齊、蕭梁自然成為魏收筆下的「島夷」。魏收對這批島夷的所作所為可說是無情揭露，南朝歷任諸君幾乎無一倖免，皆是無道昏君。論劉裕則：「島夷劉裕，……家本

---

<sup>103</sup> 分見魏收：《魏書·僭晉司馬叡傳·德宗》，頁 2104、2108、2109。

<sup>104</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10。

<sup>105</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13。

寒微，住在京口，恒以賣履為業。意氣楚刺，僅識文字，樗蒲傾產，為時賤薄。嘗負驃騎諮議刁達社錢三萬，經時不還。……落魄不修廉隅」<sup>106</sup>，簡直把劉裕當成市井無賴，又說「裕本寒微，不參士伍，及擅時政，便肆意殺戮，以威懼下」<sup>107</sup>；劉義符「昏暴失德」<sup>108</sup>；劉義隆「好行小計，扇動邊民，內起山苑，窮侈極麗，役使百姓，江南苦之」<sup>109</sup>；劉劭弑父篡逆<sup>110</sup>；劉駿淫穢其母，「穢汙之聲，布於甌越」<sup>111</sup>；劉子業「淫其姑謝室……即義隆第十女，其新蔡長公主」、「性尤凶悖……遂剝剔支體，抽裂心藏，挑其眼睛，投之蜜中，謂之鬼目粽」<sup>112</sup>；劉彧「奢費過度，務為彫侈……境內騷然，人不堪命」<sup>113</sup>；劉昱「狂走逸遊，不捨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刃為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略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重關自守。又搥拍鍼鑿錐鋸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搥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十數。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為樂，無所誅害，則憂思草草。……與營署女子通好，自齋私服贈之」<sup>114</sup>。但見劉宋諸君治道頗失，並一再發生弑父殺子、骨肉相殘、母子亂倫、穢亂後宮等罔顧人倫之事，簡直無恥至極，故有史臣曰：「窮凶極迷，為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sup>115</sup>

至於篡宋自立的蕭道成，除了云其「每在疆場、擾動邊民」<sup>116</sup>之外，更兩云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明」<sup>117</sup>，批評道成毫無人臣之禮；蕭蹟「特奢

---

<sup>106</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29。

<sup>107</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32。

<sup>108</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35。

<sup>109</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37。

<sup>110</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40-2141。

<sup>111</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44。

<sup>112</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45-2146。

<sup>113</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50。

<sup>114</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51-2152。

<sup>115</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53。

<sup>116</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61。

<sup>117</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63。

侈……性貪恠……好利……遊獵無度」<sup>118</sup>；蕭昭業「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令女巫楊氏禱祝……令蹟早死」、「自蹟葬後，昭業微服而出，遊走里市，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與羣小共作鄙藝，擲塗賭跳，放鷹走狗諸雜狡獪，日日輒往，以此為常」、「昭業與其父寵姬霍氏淫通」<sup>119</sup>；蕭鸞「既殺昭業，專權酷暴，屠滅蹟等子孫」<sup>120</sup>；蕭寶卷「昏狂，政出羣豎」、「昏暴日甚，內外不堪」。<sup>121</sup>蕭齊諸君較之劉宋諸帝，並無根本上的差異。

蕭梁由於與北齊同時代，故只錄蕭衍一人。蕭衍專事禮樂衣冠乃不爭之事實，故魏收主要批評的重點在他晚年迷信佛道，導致風俗敗壞、民怨沸騰：

衍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於鍾山立大愛敬寺，兼營長干二寺，皆窮工極巧，殫竭財力，百姓苦之。曾設齋會，自以身施同泰寺為奴，其朝臣三表不許，於是內外百官共斂珍寶而贖之。衍每禮佛，捨其法服，著乾陀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誡，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為皇帝菩薩。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責其上禮獻物，多者便云稱職，所貢微少，言為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斂，劫剝細民，以自封殖，多妓妾、梁肉、金綺。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發召兵士，皆須鎖械，不爾便即逃散。其王侯貴人，奢淫無度，弟兄子姪，侍妾或及千數，至乃回相贈遺。其風俗頹喪，綱維不舉若此。」<sup>122</sup>

除此之外，魏收在〈蕭衍傳〉中竟有以下之陳述：「衍自以持戒，乃至祭其

---

<sup>118</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64。

<sup>119</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65-2167。

<sup>120</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68。

<sup>121</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70-2171。

<sup>122</sup> 見魏收：《魏書》，頁 803。

祖禰，不設牢牲，時人皆竊云，雖僭司王者，然其宗廟實不血食矣。」<sup>123</sup>此所謂時人，蓋指南朝臣民，既是南朝臣民又豈會以蕭衍為僭立？魏收自云之爾。《魏書》最後總評齊、梁之世曰：「二蕭競塗泥之中，同蝸角之戰，或年纔三紀，或身不獲終，而偷名江徼，自擬王者，考之遂古，所未前聞。昔句踐致貢而延世，夫差爭長而後死，兩寇方之吳越，不乃劣乎？」<sup>124</sup>言春秋已有吳、越僭立江左，然齊、梁僞朝與當年吳、越相較，乃遠遠不及。

## （二）藉由北魏臣民對於南方社會的印象去醜化對方

魏收除了透過「僭晉」、「島夷列傳」的體例否定南朝的正當性，其行文之際更一再透過北魏臣民對南方社會文化的觀感去醜化對方。〈陳建傳〉記載趙郡公陳建、晉陽侯元仙德、長樂王穆亮、平原王陸叡等人聯名上表孝文帝，其內容如下：

自永嘉之末，封豕橫噬，馬叡南據，奄有荆楚。及桓劉跋扈，禍難相繼。岱宗隔望秩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sup>125</sup>

〈陸俟傳附陸叡〉記載陸叡上表孝文帝：

今蕭鸞盜有名目，竊據江左，惡盈罪稔，天人棄之。……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sup>126</sup>

〈源賀傳〉記載賀懷上表宣武帝：

---

<sup>123</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87。

<sup>124</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88。

<sup>125</sup> 見魏收：《魏書》，頁 803。

<sup>126</sup> 見魏收：《魏書》，頁 912。

南賊遊魂江揚，職為亂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貴臣重將，靡有子遺，崇信姦回，昵比閹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sup>127</sup>

〈盧玄傳〉記載盧淵上表孝文帝曰：

今蕭氏以篡殺之燼，政虐役繁，又支屬相屠，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踵皇澤，正是齊軌之期，一同之會。若大駕南巡，必左衽革面，閩越倒戈，其猶運山壓卵，有征無戰。<sup>128</sup>

〈高閭傳〉記載高閭上表孝文帝：

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sup>129</sup>

〈宋傳弁〉記載高祖與宋弁論江左事：

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為幸。」<sup>130</sup>

---

<sup>127</sup> 見魏收：《魏書》，頁 924。

<sup>128</sup> 見魏收：《魏書》，頁 1047。

<sup>129</sup> 見魏收：《魏書》，頁 1207。

<sup>130</sup> 見魏收：《魏書》，頁 1414。

而〈蕭衍傳〉所載慕容紹宗檄蕭衍文，則於南、北朝歷史政治文化之發展有全面的對比，茲摘錄大段文字如下，以見北人對南朝的鄙視心理：

自晉政多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鬪之場，生民為鳥獸之餌；則我皇魏握玄帝之圖，納水靈之祉，駕雲車而自北，策龍御以圖南，致符上帝，援溺下土，怪物殛死，淫水不作，運神器於顧眄，定寶命於踟躕，恢之以武功，振之以文德，宇內反可封之俗，員首識堯舜之心。沙海荒忽之外，瀚漠羈縻之表，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綴，莫不繩谷釣山，依風託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之行。唯夫三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自偽晉之後，劉蕭作慝，擅僭一隅，號令自己自。……蕭衍輕險有素，士操蔑聞，睥睨君親，自少而長，好亂樂禍，惡直醜正，巧用其短，以少為多。……曲體脅肩，搖脣鼓舌，候當朝之顧指，邀在位之餘論。遂汗辱冠帶，偷竊藩維。及寶卷昏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有犯之節，遽滅人倫在三之禮，憑妖假怪，鬼語神言，稱兵指闕，傾朝鳩主，陵虐孤寡，聾愚士民。……遂使頑嚚子弟，肆行淫虐；狡猾羣小，縱極貪恠。剝割蒼生，肌肉略盡；剝剔黔首，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餓 詎侔其禍，慄慄周餘，救死無地。至於矯情飾詐，事非一緒。<sup>131</sup>

經由這些實例可以發現北朝人士在南北政治文化長期對立中，已然形成根深柢固的排他性文化心理結構。關鍵在於北魏孝文帝太和文治全面復甦漢文化，不僅為北人找回因永嘉之亂所失落的文化自信，更激發北人政治文化的大一統信念。至於當年衣冠渡江的東晉及後繼的宋、齊、梁，最終淪為北人眼中僭立邊鄙，遠離禮樂文化的叢蕪小賊。

### （三）透過北降南士的背逆歸正去凸顯北魏的政治正統性

---

<sup>131</sup> 見魏收：《魏書》，頁 2179。

魏收除了藉由北朝人士的自我標榜及對南方政權的攻訐之外，亦透過來降之士對南方敵逆的嚴厲批判及對北魏朝廷的恭維，凸顯強調北魏的政治正統性。〈劉昶傳〉數載孝文帝朝降士劉昶的表奏：

臣殖根南偽，託體不殊，秉旄作牧，職班台位。天厭子業，夷戮同體，背本歸朝，事捨簪笏。臣弟或廢姪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義難奪，為臣之典靡經，棠棣之詠可修，越敬之事未允。

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廢昏立德，扶定傾危，萬里奔波，投蔭皇闕，仰賴天慈，以存首領。

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冀恃國靈，釋臣私耻。

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流，為不朽之法，豈唯髣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sup>132</sup>

〈常珍奇傳〉載常珍奇上表獻文帝曰：

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亡身，志陳報答，遂與雍州刺史袁顛、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義，奉戴子勛，纂承彼曆。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劉彧滔天，殺主篡立，蒼生殄悴，危於綴旒。伏惟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所願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文檄，喻以吉凶。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荊雍九州，北面請吏。<sup>133</sup>

<sup>132</sup> 見魏收：《魏書》，頁 1308-1311。

<sup>133</sup> 見魏收：《魏書》，頁 1366。

〈李苗傳〉載李苗上表宣武帝曰：

昔晉室數否，華戎鼎沸，三燕兩秦，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圯裂。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鼎河洛，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楚，國富兵強，家給人足。<sup>134</sup>

姑且不細論南士北奔之政治因素為何，單就表面現象觀之，至少有兩個層面的意義，即「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意義。<sup>135</sup>投奔北朝的南朝人士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之下，基於「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所匯聚而成的新意識結構與價值取向，願意完全站在北朝的政治立場與文化心態去評價事物，支配言行，以致於對南方政權產生強烈的否定心態，而否定的同時自然也強化了北魏的正統地位。

#### （四）謹慎處理南北交聘的歷史紀錄以防正統旁落

魏收既然不承認南朝的政治地位，在一些歷史人物的言行處理上自顯得小心翼翼，深怕正朔旁落敵逆之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公元四五〇年，北魏與劉宋對峙於彭城，雙方派李孝伯、張暢於陣前對談。當時使節的談論內容會有一種稱為「語辭」的書面記錄，《魏書·李孝伯傳》與《宋書·張暢傳》對於這次會談各有詳細記錄，可能就是來自於這類語辭。不過，二書所記載的內容卻有極大差異。如《宋書·張暢傳》云：

孝伯又曰：「長史，我是中州人，久處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不得

---

<sup>134</sup> 見魏收：《魏書》，頁 1594。

<sup>135</sup> 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在經驗中表現為特定個體或群體，與某種文化系統以及特定時空條件中某一行政權力系統的關係。文化認同指特定個體或群體認為某種文化系統（特別價值觀）內在於自己的心理和人格結構之中，並願意循此以評價事物，支配行為。政治認同指特定個體或群體認為某一行政權力系統對其所屬的生活區域及其自身所擁有的某些權力是符合道義的，因而願意接受該政體之統治。參見陳明：〈從道統政統概念理解歷史上文化認同政治認同關係的嘗試〉，收錄於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一九九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44-257。

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語者，長史當深得我。」<sup>136</sup>

就此語境觀之，「南方隱然是中國（華風）正統，『北國』則是異族，李孝伯倒像是和敵方暗通款曲的間諜。」<sup>137</sup>像這樣的記載，當然不會出現在《魏書·李孝伯傳》中。〈李孝伯傳〉記載如下：

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為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為隣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隣國之臣？」<sup>138</sup>

並說：

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sup>139</sup>

在魏收筆下，李孝伯與張暢似乎形成一種各自代表「中原正統」與「邊鄙僭偽」的「上」對「下」關係。此外，魏收於傳末還特錄李孝伯後人李豹子於政光三年（522）的奏書，以說明《宋書》之荒誕：

---

<sup>136</sup> 見沈約：《宋書》（台北：鼎文書局，1998年7月），頁1603。

<sup>137</sup> 此楊玉成語，見氏著〈士庶、性別、地域——論南北朝的文學閱讀〉，收錄於李豐楙、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詮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頁68-69。次處論述於楊文多有參考，特此註明。

<sup>138</sup> 見魏收：《魏書》，頁1168-1169。

<sup>139</sup> 見魏收：《魏書》，頁1172。案：沈約《宋書》則云：「孝伯言辭辯贍，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頁1605。

劉氏偽書，翻流上國，尋其訛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略敘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國美。<sup>140</sup>

在南北朝分立的特殊歷史情境下，這類歷史文本的書寫本身就極具政治性，以自我矜誇、壓過敵逆，達到政治宣傳的效果為主要目標。歷史發展到北齊宣武帝高洋之世，因南北朝國力懸殊而打破以往的對等關係，形成南朝對北朝納貢稱臣的情形；梁元帝遷都江陵更形同放棄建康兩百多年的正統圖騰。於是魏收趾高氣昂地站上華夏歷史文化正統的高度俯看南朝，為這批僭立江左的島夷立傳寫史，雖說體例頗有模仿《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但盛氣凌人的態度與倨傲心理卻不可同日而語。

## 貳、反映在文學創作上的矛盾心理

北魏分裂之前，蕭衍屢次遣使議和，但由於北魏態度強硬，硬要其俯首稱藩，因而雙方戰事頻仍。北魏分裂之後，蕭梁又主動遣使與東魏通好，於是雙方互聘頻繁，南北交流愈發熱絡，彼此之間從上到下的競爭心理也愈來愈烈。《北史·李諧傳》記載：

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為之拊掌。<sup>141</sup>

使節來訪在當時居然成為轟動朝野的焦點新聞事件，而聘使本身之遴選又都是本國一時之選，以文學優贍、容止可觀之士擔任。因此，聘使除了完成朝廷交辦的

---

<sup>140</sup> 見魏收：《魏書》，頁 1174。

<sup>141</sup> 見李延壽：《北史》，頁 1604。

公務，也擔任文化大使的角色，於是文學競賽搬上國際舞台，彼此互相驗證誰才是真正的華夏衣冠、文化正統。就這樣看得圍觀群眾與私下派人關注的高澄緊張兮兮，一旦本國使臣有傑出表現便興奮不已。

魏收作為北朝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及文學家之一，又曾屢次擔任聘使或主客的工作，《魏書·自序》曾有如此之追憶：「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蕭衍，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衍及其羣臣咸加敬異」<sup>142</sup>，對自己在外交表現上的自滿溢於言表。《陳書》記載梁使徐陵出使東魏而與魏收相互揶揄鬥智的情形：「（徐陵）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sup>143</sup>

魏收擔任外交官的經驗使之對南北文士之間的較量尤為敏感，《魏書·祖瑩傳》記載：

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慚色。瑩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即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sup>144</sup>

楊玉成對此有相當精湛的解讀：

---

<sup>142</sup> 見魏收：《魏書》，頁 2325。

<sup>143</sup> 見姚思廉：《陳書·徐陵傳》，頁 326。

<sup>144</sup> 見魏收：《魏書》，頁 1799。

王肅的〈悲平城〉被說成〈悲彭城〉，根據佛洛伊德的理論，元勰的口誤（失語）可能反應內心的慾望與焦慮，一下子「甚嗟賞之」一下懼怕「為吳子所屈」，既受影響又試圖自我防衛。王肅詩是邊塞主題，「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這是南人的異域想像；平城是北魏故都，祖瑩察覺其中隱含的地域歧視，將地點從北方「平城」移到南方「彭城」，在紙上重演對方的屠殺（屍積、血流），雙方就在紙上蹂躪對方的領土。<sup>145</sup>

姑且不再談論魏收詳載此事的意識型態或政治動機等問題，但是元勰此種欣羨南朝文學的矛盾心理確為當時北朝文士的普遍心態；而祖瑩技壓南朝文士的文學表現更是北朝文士心之所望。就魏收而言，便亟欲在南北文士的辭章較量上力求表現，他最引以自豪的一件事是：

自南北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蕭衍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南人復書，依以為體。<sup>146</sup>

魏收將當時南北通好的國書行款「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的用語巧妙地改成「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在語詞上既取消了「彼」、「此」的界線，在語意上又能不落痕跡地把對方領土籠罩起來，<sup>147</sup>南朝方面無計可施，只能仿效其作法，依以為體，而文學語言也成為南北朝之間象徵主權、爭奪正統的工具。文學成為南北文化相爭的例子中最為人所樂道的是：

---

<sup>145</sup> 見楊玉成：〈士庶、性別、地域——論南北朝的文學閱讀〉，收錄於李豐楙、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詮釋》，頁 72。

<sup>146</sup> 見魏收：《魏書·自序》，頁 2325。

<sup>147</sup> 參見王師文進：〈北魏文士對南朝文化的兩種態度——以《洛陽伽藍記》與《水經注》為中心的初探〉，《臺大中文學報》第二十四期，頁 145。收錄於師著：《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

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還，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為魏公藏拙。」<sup>148</sup>

表面上這段史料反映了南北朝文人相輕的情形。但更深層的本文內涵遠超過南方文人對北方文學價值的貶抑，而是南方文化對北方文化的輕蔑。倘若徐陵將魏收文集帶回江左傳播，無疑形同接受北方文化。至於魏收雖然在言行上一再否定南方文化，但從他欲將自己作品傳播南朝的心態觀之，其內心深處仍不得不承認南朝才是真正禮樂之鄉、圖書之府。當魏收撰成《魏書》時，「以為直置祕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sup>149</sup>，從這種亟欲使南朝人士得見其作品的心情，不難理解在文化上南朝還是具有優勢。

魏收在文學創作上經常仿效南朝文學家。據《北齊書·魏收傳》的記載：

收每議陋邢昺文。昺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sup>150</sup>

魏收之所以能以散文名家，成為北方筆語之大宗，與他對任昉文章的學習吸收有關。任昉以表、奏、書、啓諸體名冠齊梁文壇，其散文與沈約的詩並顯於當世，有「任筆沈詩」<sup>151</sup>之並譽。任昉散文之卓絕連沈約都讚賞有加，《梁書·任昉傳》即云：「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sup>152</sup>

另外，從《文選》選錄任昉文章多達十七篇而拔得頭籌觀之，亦可想見時人對任昉文章之推崇。魏收今存文十三篇，考其《冊命齊王九錫文》、《禪位文》分

<sup>148</sup> 見劉餗：《隋唐嘉話》（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1月），頁55。

<sup>149</sup> 見李百藥：《北齊書》，頁491。

<sup>150</sup> 見李百藥：《北齊書》，頁492。

<sup>151</sup> 見李延壽：《南史》（台北：鼎文書局，1998年11月），頁1445。

<sup>152</sup> 見姚思廉：《梁書》（台北：鼎文書局，1999年5月），頁253。

別與任昉《策梁公九錫文》、《禪位梁王冊》神形俱似。李建棟曾比較魏收與任昉之文章，以見其模擬之跡，今重新整理如下：任昉《策梁公九錫文》以「此又公之功也」承引，末尾用「欽哉」「以弘我太祖之休命」作結。魏收《冊命齊王九錫文》以「此又公之功也」承引，末尾所述賞賜之語與前者賞賜之語多有相同，亦以「往欽哉」「對揚我太祖之顯命」作結。任昉《禪位文》以「咨爾梁王」開頭，末尾有「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允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歟！」魏收《禪位梁王冊》以「咨爾相國齊王」開頭，末尾有「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于王，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祇承歷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sup>153</sup>

由是觀之，邢邵批評魏收偷竊任昉文章其來有自，並非無中生有，加上《北齊書·魏收傳》記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sup>154</sup>

《顏氏家訓·文章第九》亦載：「邢子才、魏收具有重名，時俗准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事非，乃邢、魏之優劣也。」<sup>155</sup>邢邵、魏收作為北朝文壇領袖，尚且慕效南方文學，更遑論其他北方文士。<sup>156</sup>

北朝文士模仿南朝文學不乏其例，自北魏吞併青、齊之地以後，南方降人入北者與日遽增，也逐漸將南方文化帶進北朝。孝文帝積極漢化以後則愈見南方文學的影響力。以北魏洛陽時期最重要的作品《水經注》為例，錢鍾書曾取《水經注》的語言文字與南朝吳均、簡文帝等人的詩文進行比對，仿效之跡清晰可見。

---

<sup>153</sup> 參見李建棟：《魏收三論》（西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雷樹田先生指導，2003年3月），頁35-36。

<sup>154</sup> 見李百藥：《北齊書》，頁492。

<sup>155</sup> 見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9月），頁254。

<sup>156</sup> 相關議論可參見林晉士：〈南北文化交流對北朝文學發展的影響〉，《屏東教育大學學報》第二十六期（2007年3月），頁445-470。

<sup>157</sup>譚家健亦曾指出《水經注》的語言技巧，顯然吸收南朝山水詩的成就，其中又以謝靈運、吳均爲主，旁及謝朓、鮑照諸人。<sup>158</sup>即便是對南方文化極盡挑剔的《洛陽伽藍記》，對南方地記亦多有參考。可見，邢邵、魏收等人仿效南朝詩文的行爲其實是北朝社會的風氣，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論北朝之文學即云：

北史文苑傳所述文士，始於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及袁翻、常景等，後則有袁躍、裴敬憲、盧觀、邢藏、裴伯茂、孫彥舉、溫子昇諸人。視子昇較後者，則有邢邵、魏收二人。諸人所作，類擬南朝，鮮見自立。……都是南歌，看不出一點的北國的氣息出來。<sup>159</sup>

人原本就有朝向更高潛能實現的慾望，因而會向著優於自己的對象學習，產生一種向上比較（upward comparison）的心理，甚至最終會有想要超越的渴望。

魏收雖私下規撫南方文學，然在南北文化劇烈爭奪的歷史情境與北朝正統意識型態的強烈驅策之下，他仍刻意強調北朝文學的水平足以頡頏南朝。《魏書·文苑傳》曾引用濟陰王暉業讚揚溫子昇的話去凸顯北朝文學的深度：

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sup>160</sup>

除了北朝人士的自我矜標以外，魏收同時透過梁武帝對溫子昇的極高評價，以及吐谷渾國王對溫文的珍愛去烘托北朝文學的成就：

---

<sup>157</sup> 見氏著：《管錐篇》第四冊（台北：書林出版社，1980年8月），頁1456-1457。

<sup>158</sup> 見氏著：〈試論水經注的文學成就〉，收錄於譚家健，李知文選注：《水經注選注》（台北：建宏出版社，1994年8月），頁9。

<sup>159</sup> 見氏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台北：明道書局，1991年1月），頁261-262。

<sup>160</sup> 見魏收：《魏書》，頁1876。

蕭衍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sup>161</sup>

由是觀之，《魏書·文苑傳》的設立自有其欲和南朝文學互別苗頭的意味。而此舉卻也意外保留了北朝文學發展的梗概，使後人對北朝文學尚能稍作認識。以此論之，則魏收於文學史之功亦不可沒。

#### 第四節 小結

北魏孝文帝遷都漢化不僅鬆動漢民的夷夏之防，更重構了北朝的民族認同，甚而激發出莫名強烈的歷史文化使命感，因而在政治意識型態上完全以華夏正統自居，也為南北文化之爭帶來前所未有的張力。

酈道元作為天生的山水美學主義者，經歷孝文帝太和文治，服膺「德化四鄰」、「學在四夷」的儒家教化，頗能寬宏看待周邊民族與華夏之間的文化差異。北魏洛陽時期的政治社會氣氛及社群關係的影響帶動，使他能夠以審美的眼光及寬闊的胸襟撰寫《水經注》，過濾掉南北之間的負面情結，掙脫客觀現實上政治對立的束縛，轉而環抱南方地域山水文化的佳美，開創極大的地理空間美學與歷史文化格局，也為爾後南北文化的融合樹立了絕佳典範。

京師遷鄴，南北通和，帶來前所未有的交聘熱潮及文化激鬥，楊銜之因而成為激進的北朝正統主義者。《洛陽伽藍記》不僅對南方地域文化百般挑剔，對南方人士更是不假辭色，極盡嘲諷羞辱之能事，甚至書中屢有誇張不實之描寫。楊銜之所以會有如此強烈的排他心理，除社會氣氛使然，寫作期間遭逢高歡病逝、侯景叛魏、高澄遇刺，致使朝政不安應該也有極大的關係。另外，梁武帝蕭衍在

---

<sup>161</sup> 見魏收：《魏書》，頁 1876。

江東專事衣冠禮樂以號召民心，也給予楊銜之相當程度的正統危機意識。

《魏書》撰寫的主要期間正是北齊國力最強盛的階段，反觀南朝卻因侯景之亂導致必須稱藩納貢、奉齊正朔。同時梁元帝遷都江陵的決定更形同放棄兩百多年的建康正統圖騰，遂使魏收能以上國之姿立論南北文化，褒貶之間顯得義正辭嚴，甚至將東晉南朝貶為禮樂未沾的蠻夷之邦。然而，南朝的風流文采絕非政治意識型態能夠遮蔽，包括溫子昇、邢邵、魏收在內的北朝文人，無不傾慕南朝文學而私下學習。因此，造成魏收在歷史意識上藐視南朝政權，在創作活動上卻規撫南朝文學的矛盾心理。